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 240 期)
文化研究

# 积极语用:
# 提升我国学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潘 涌

**摘 要:** 文章首先反思理论学术研究中消极语用的种种弊症,诸如狭隘滞后、缺少内涵和品格的旧概念和旧命题,固化封闭、因袭单一的消极论证文体,枯燥乏味、无关痛痒、空洞铺陈的消极表达风格,等等。在此基础上,文章正面阐释积极语用是提升我国学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就学理逻辑而言,积极语用所生成的个体"表达力"乃至"创新力"与国家学术文化软实力天然构成高度相关的正比例关系;就概念内涵而言,积极语用既是源自外来"语用学"的学术术语,更是超越"语用学"单一学科、释放学术主体生命之创造能量的基本手段;就时代条件而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和新实践,为研究者主体提供了社会观察和深度考量、思想研究和精彩表达的外部契机。进而文章重点论证如何通过积极语用来提升国家学术文化软实力:贯彻"百家争鸣"、拓展思维空间,为研究主体的思想探险即内语用——独立思考而构建必要的前提;聚焦现实问题、释放创新思维,确立积极语用的应然逻辑起点,即为展开积极的内语用"思考"铺砌思维轨道;提炼新鲜话语、作出创新判断,以落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积极语用的核心目标;创新传统狭隘文体、促进表达风格多元,推动表达范式的深度转变。

**关键词:** 积极语用;学术文化;软实力;重要途径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9142(2018)01 - 0067 - 10

习近平同志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京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对理论学术界寄予真挚和深远的期待。他敏锐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①]。这是他最新一次对学术文化发展中的"语用问题"系统提出具有蕴涵深长的反思价值和建树意义的指导意见。值得认真关注的是,习近平同志的意见将语用能力与学术原创能力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来探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早在 2013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曾经聚焦外宣工作中的语用弊症,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引发广泛共鸣的意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

收稿日期:2017 - 08 - 15
作者简介:潘涌,男,浙江嘉兴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浙江 金华 321004)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强国战略研究"(2013GH026)、浙江师范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预研项目"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研究"成果之一。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05 月 19 日。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①]2014 年 3 月,习近平同志在柏林会见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时,他更是指出:全球化背景下,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文化强国的宏伟战略目标出发,持续关注并分析广义的各种语用问题,提出了诸多具有指导价值的建设性意见。因此,置身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特定历史新时期,如何深刻转变语用范式、变消极语用为积极语用,充分释放学术研究主体的思想力和表达力,进而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文化软实力——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同仁体现学术担当精神和学术建树责任的一项重要时代使命。

本文语境中,"积极语用"是学术研究主体基于心灵思考、分析比较而向外输出、深入论证的语言表达行为。广义的语用,包括输入型和输出型两大行为类别,具体指学术主体阅读材料、爬箩剔抉、归纳演绎、概括升华的全部语用过程及其行为。作者的主要表达环节是确定概念、阐释辨析、提炼命题、选择风格和文体特色。洋溢思想活力、充满生命激情的作者,往往表现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科学创造性,给阅读者带来启思动情的显著积极效应。积极的生命存在彰显出积极的学术表达,积极的学术表达具化为新概念、新命题、新论证和新文体,仿佛思想新风给阅读者带来清心明目、愉悦心智、振奋精神的积极情感体验。学术受体(即阅读者)的积极情感体验,则反证了学术主体(即作者)的积极语用行为及其价值效用。语用过程和语用行为的品质最能够显现学术主体的存在状态和质量。虽然,西方语用学侧重在口语表达,但广义语用行为当然涵盖学术主体的书面表达,无论是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还是格莱斯(Herbert. Paul. Grice)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其核心都是关注"语境"中主体使用语言的"意义"(meaning in use)。这种使用,是输入"他者的表达"与输出"自我的表达"两者的有机统一。[③] 换言之,本文语境已从传统语用学着眼于口语交际拓展到"语用"行为的全部领域,主要是指学术性著述中的书面表达。其中,特别专指学术主体主动和充分释放思想力和表达力,由内心到感官、由输入(接受)到输出(表达),旨在创造性地论证新观念、新命题、新思维的一系列语用行为以及最后的精神结晶和载体——篇章。语用行为,不但呈现出学术主体思维演绎、心智论证的具体过程,更是显示出特定学术主体贯穿其中的独有个性、思维活力和表达品质等等诸多方面的精神质量,从而最大程度地展示出研究主体的学术原创力,标志着研究者入得其中、出乎其外的一种高迈的学术境界。

## 一、消极语用:学术文化软实力走弱的弊症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消极语用倾向,导致"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太相称"这样一种后果。[④] "语用"在这里是指研究主体的语言表达行为,包括口头与书面的表达行为,重点则是后者。消极语用暴露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现象极其斑驳复杂,从某些表达者的"言语内容"到"言语形式"都有一定的反映。

表症之一是习惯于消极滞后、缺少内涵和品格的"旧概念"和"旧命题"。有些作者安于通过重复性的思维"规训"和"宣化"来简单地代替理论学术的原创性"研究"。集中暴露在对滞后概念和命题的粘贴复制上,沿用多年不变的陈旧概念、滞后命题及其承载的旧思维、旧立场,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内学术问题的讨论,如果依然无视全球化时代知识和思维的日益更新,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①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 年 08 月 21 日。

② 新华网:《习近平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http://news. xinhuanet. com/world/2014 - 03/29/c_126331994. htm. 2014 - 03 - 29.

③ 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 29 页。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05 月 19 日。

初期从苏联沿袭过来的某些陈旧概念或滞后命题,那么,无异于留有“画地为牢”的嫌疑,以致于不自觉地“被”限制创造性思想的积极生成。在对传统国有老企业的改革中,经济学界常常迁移西方经济学中“僵尸企业”这一别有意味、含蕴丰富的概念,用来指称长期利润亏损、丧失生产活力和扭亏前景、甚至资不抵债却又依赖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而不破产、不倒闭的濒危企业;[①]同理类推,在理论学术界,同样存在着仅仅遗留语词的物理外壳却早已被抽空创新思维的内生活力、丧失可持续研究前景的“僵尸概念”“僵尸判断”或者“僵尸命题”,它们以苍老古板、冷漠高傲的语象而令人肃然,却无法激发和释放接受主体的新思维活力,甚至连构建主体和使用主体自身的思维活动也很难趋向踊跃积极,因而限制了表达主体顺畅展开积极主动、开启读者思维空间的智慧论证。面临全球化进程深入、广泛展开的今天和明天,因袭不变地使用这样的老旧概念或者滞后命题来作为研究的一种逻辑平台,在遇到改革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新困惑时,由于前后两者存在着一种难于消弭的时代鸿沟,研究者似乎很难推导出令人信服的新观点,更难形成深蕴启发性价值的新思维体系。

表症之二是满足于固化封闭、狭隘单一的消极“论证文体”。这里是从“文体学”立场出发而评价研究者的整体语用行为的。本来作为形式要素之综合的“文体”,自然不是一种游离于人自身精神世界的简单化、表浅化和感性化的“套装”,但由于长期沿袭使然,某些理论学术文体已经陷入固化甚至僵化的状态。目前习惯性操持的“理论体”,不少是“八股腔”浓重、假大空盛行,写作程式标准化、使人望而生畏的华丽“套装”。例如,论证当前学界的热点问题“话语创新”及其途径,难免“中外融通”“古今结合”“理实相契”如此这般的三段论——不是说不可以如此“三段论”,但假如学者们三五成群这般议论话语创新问题,何来真正意义上的“话语创新”?换言之,用“同质化”的思路来讨论改革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那么,就似乎值得商榷一番“套装”之内有无灵魂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了。我们固然需要高瞻远瞩、视接霄壤、表征一个时代的宏论,固然需要观念清新、论证严密、晓畅深刻、足以激发人的思想活力的理论文章,但这并不等于信手拈来而流于空泛、止于高调却丧失思想内核的陈旧平庸之论。直言之,人云亦云,不是文章;按部就班,难成学理。就思想力而言,面对现实问题而展开的的独立评论、深邃思辨,自觉拓展出学术主体自足自享的新思路并以特色结构的新文体承载之——这既远胜于照搬高头讲章、引“经”据“典”,也远胜于类似浮泛之论、同质思维之套路。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复杂现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应该就是孵化创造性精神智慧的“思想界”,而孵化新概念、新判断、新思想的最恰当载体就是由作者独立、新颖的观点所统领的“评论体”,是贯穿其中的逻辑理性、缜密演绎的思辨性论证过程。至于某些“学术体”,一般容易为人首肯且有走红势头的多是偏重作为事实之材料与数据之统计的混合文档,且常常以平庸寡味、失缺鲜活的语词出之。学术文体当然要追求“实”——但不仅仅是事“实”,更是理“实”,文字的表达只有以思想作灵魂贯穿之,才可能祛除呆板木然、机械划一的“文字相”。某些“学术体”片面追求西方的实证研究,过度信奉材料和数据的“科学性”(甚至以之取代“思想性”和“人文性”),以致忽视由作者独立观点所统领的思想“评论”,更遑论其中是否贯穿充满逻辑理性、精彩演绎这种深邃缜密的思辨过程。确切地说,学术文体应然的内核是蕴涵强烈“问题意识”的精致和完整的思辨,主要语用形式应当是独立自主的缜密“评论”,唯此,才可能具备直面现实问题的卓越的理性品格。尤其面对斑驳陆离的改革现实,真正的学术文体,其最重要的创新价值就必然是:凭借“独立评论”来承载新颖观点,以破解困扰人们思维的现实之惑。至于上述流行的某些“学术体”和“理论体”之所以沦为“消极语用”的典型,盖因其中的文体“匠气”过重,浮游其中的“学究气”和“理论腔”多了些,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却明显少了些。因此,习近平同志有鉴于此,不但常常敲打和批评“八股腔”文体文风,而且早在浙江省委工作期间就以“之江新语”的独特形式向理论学术界、社会各界群众极其生动地示范了不乏启迪价值的新文体、新文风——这就是“点赞指

① 互动百科:僵尸企业。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3%B5%E5%B0%B8%E4%BC%81%E4%B8%9A/1782362?fr=alAddin.

数”一路走高、广被誉美的“‘平语’近人”①。至于他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内涵足、思想新的精辟讲话,更是高瞻远瞩、从容大气,质疑痛切、启示深远,诸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革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这样思想含量丰富的“金句”令人深长品味,成为短、精、实这种新文体、新表述广具示范价值的积极典例。

表症之三是安于枯燥乏味、无关痛痒、空洞铺陈的消极表达风格。这既是一个语用风貌问题,更暴露出学术主体运用语言“深入掘进”思维风险地带的原动力不足。就表象而言,“表达风格”的消极仅仅暴露为“语词”偏于陈旧、尤其是“语词组合”过度标准化、规范化和有序化,常常给读者“似曾相识”甚至“高度熟悉”的雷同感;实质上正暴露出表达主体缺失自由挥洒、敢于标榜的独立创新心态,以致于追求稳健妥帖甚过敢于适度探险和自觉拓新。从语用学的学术立场看,语词组合及其持续不断的创新重构,应是主体思维独辟蹊径、深入拓展的一种精神活动,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学术思维创新就是语词与语词构建津梁、横渡山水的“风险之旅”,由语词而概念、由概念而命题、由命题而整体思维——全面地带动着表达风格的蜕变和出新。凡是消极表达的文章,一般都存在着语用的共同庸俗弊端:语词量少、组合雷同、句型单一、内涵浅表,读之使人味同嚼蜡。这种消极表达风格的后面隐含着一种固化思维:理论学术的表达止于“明白达意”即可(这种认识本身有欠积极),似乎完成缜密严谨、渐次深入的逻辑论证,完全不必要自觉的修辞努力,不必要适度的诗性润色,不必要一定的情感活力对理性思维的恰当滋润。极端者,必然导致泛出表面、难以卒读的“文字相”:满目文字、不睹才思,只剩符号、失缺锐气。这种表达的“空泛化”、“标签化”,终致文山堆叠、难觅青葱,“韵外之致”“味外之旨”②难免泯然矣!

## 二、积极语用:提升学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且可行的途径

前文已述,本语境“积极语用”是研究主体基于心灵思考、分析比较而向外输出、深入论证的语言表达行为,它与学术文化是一体两面。学术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子概念,文化软实力则是软实力的下位概念。与“硬实力”相对应的“软实力”概念,源自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是对国际政治博弈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动态、新趋势的一种准确概括,显示出不乏心计的美国政治战略家对全球政治发展战略前景的新判断、新策略、新思维。③ 所谓的“学术文化软实力”,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及其思维成果的感染力、共鸣度和美誉度,汇合成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长远影响力。支撑学术文化软实力的必然是、而且首先是学术思想的鲜活创造力,必先有学术思想创造力之“本”,尔后才有学术文化软实力之“表”。提升学术文化软实力,当是增强中华民族对“文化自信”的切实途径之一;而提升学术文化软实力,当又离不开语言创新表达能力的不断走强,即期待学术研究主体源源不断产出富有东方特色的“中国概念”“中国命题”乃至完整的“中国话语”体系。质言之,学术汉语的表达力和创新力之增强,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学术文化软实力的未来命运,决定着“文化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话语权。

就学理逻辑而言,积极语用所生成的个体表达力乃至创新力与国家学术文化软实力天然构成高度相关的正比例关系。长期以来,现实语用生活中的诸多疲弱症状,本质上就是思想观念创新不足的深刻反映。后者又导致学术文化软实力的走弱,由此而陷入一种互为因果的消极循环之中。语言与学术文

①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些短论共计二百三十二篇,每篇寥寥数百字,文风朴实、形式生动、观点鲜明,不乏内涵丰富、启人深思的“习式金句”。这被广泛认为对改变“八股文风”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②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唐)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中“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美学话语,意指别有味道、值得咀嚼。

③ 约瑟夫·奈早在1990年就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中共中央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正式宣言“文化软实力”的新思维。本文“学术文化软实力”是在此基础上而提炼、发展出来的。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soft power)“巧实力”(smart power)等新概念的提出及其影响力的扩展,本身就反证了学术文化软实力之“硬”。参见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化其实同位一体、须臾不可分离,而不是某种流行观念所认为的那样:语言只是学术文化的表达工具。[①] 留有一定局限性的"工具论",本质上将语言与思维两者人为地剥离开来了,仿佛它们是彼此可以分割的不同物质形态。这里的"语言"就是指"语用",即理论思维的"存在形态"和学术论著的"显现风貌"。离开了研究主体的语言"表达",学术思维和学术文化谈何"存在"。由此意义而言,学术思维和学术文化是由人的"语用"所决定的:诸如上述以概念老旧、表达泛化、缺失严谨逻辑论证为表象的诸多消极语用及其论著,自然没有生动感人的阐释力、深刻晓畅的启发力和深入人心的影响力。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至今比较缺乏反映本土极其深刻和广泛的改革实践的"中国概念""中国命题"和"中国话语",缺乏匹配于 GDP 坐二望一的崛起中的经济大国所应拥有的国际话语权——因此,有学者热切呼吁"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②] 这些负面现象就是学术思想和学术文化趋弱的外部表症,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判断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时作出的简明扼要、反思深切的结论:"文化、语言以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国人才"已经成为主要的挑战。[③] 而以新颖概念、活力表达和逻辑论证为基本特征的积极语用,则彰显出研究主体的心智创意和思维活力,当是学术文化软实力走强趋硬的一种深刻象征。德国理论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曾经深刻地指出:"语言是人这一生命有机体在感性和精神活动中的直接表现。"[④]出自特定生命主体的动态"语用",原本作为静态和公共的"语言"有机体在特定语境中的"现在进行时",其品位极其内在和有机地反映着特定时期学术文化生产者的精神活力指数和心智发达程度,输出型的语言表达力就是主体生命思想力的逻辑外显。人,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觉和创造意识的有机物,通过书面笔墨、键盘或口唇等来输出语言,表现内心积累的思想和学识。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学术观念的负面影响和学术评价范式的严重滞后,导致在学术产出中上述消极语用现象不胜枚举。久之,极其内在和深刻地制约着理论和学术研究中思想活力的释放,更遑论学术文化软实力长远而可持续的增值。今天,在"文化强国"的执政理念主导下,理论学术语用现状与国家学术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不相适应的情形,应该正是纠偏的时候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期待的那样:"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⑤]

就概念内涵而言,积极语用既是源自外来"语用学"的学术术语,更是超越"语用学"单一学科、释放学术主体生命之思想创造能量的主要途径。语用即生命。语用之"用",强调的是智慧主体言语过程的动态行为,彰显的是研究个体贯穿言语过程的生命本质力量。它既是主体生命深度思考、踊跃表达的一种显性活力程度,更是主体输出语言符号时所表现出来的启迪智慧、感人心魂的种种卓越品质及其表达效度。因此,积极语用释放出来的是撞击阅读者胸扉的"表达力"及其蕴涵在表达者内心更深层次的"思想力"。质言之,以内在"思想力"与外在"表达力"为标志的积极语用,高度凸显出全球化时代多元开放、自由宽松的学术生态中研究主体的进取精神,释放出学术文化生产中的能动性、鲜活感和超乎寻常的深刻度,完全覆盖了主体生命的内语用(即心灵思考)和外语用(即语言外显,包括接受信息的"听、读、视"与输出信息的"说、写、评")这样内外双重层面,最终升华为贯穿主体生命语用过程与语用行为的伟大创造力。因此,"积极语用"本质上就是主体生命在特定语境中"积极存在"的一种哲学意义的象征——"积极存在"必然趋向"积极语用",而"积极语用"当然是"积极存在"的深刻表征;换言之,"语用之花"必然盛开在主体深广思维的生命沃土之上。由此意义而言,学术主体从消极语用向积极语用的

① 吕叔湘:《语言和语言学》,载《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51 页。斯大林在名篇《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亦有同样的表述:"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中央编译局译《斯大林文选》(1934 - 1952),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34 页。

② 潘涌:《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 年第 5 期,第 33 - 45 页。

③ 李光耀:《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 页。

④ 威廉·冯·洪堡特:《论与语言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关的比较语言研究》,姚小平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 页。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05 月 19 日。

研究和写作范式之转换,深刻标志着其思维状态与表达状态的实质性蜕变和飞跃,表征着主体人创造精神和创造力量在研究过程中的集中"爆发"。正如法国语言学家沙尔·巴依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所有的思想交流(即对话和表达——引者注)都预设分析和重建。"①这种由"分析"到"重建"的转换过程,展示出阅读(包括广义的考量)→比较→概括→提炼这样完整的逻辑链条,从而呈现出真正绚烂的思维图景:"每一种表达出来的思想就如同在黑暗中腾空而起的火焰,泼散出灿烂的火花。"②这种人类所深深向往的思想"火花",正是积极语用过程所迸发出来的创造力兴盛景象——值得学术主体深切地期待和执着地追求。

就时代条件而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和新实践,为学术主体提供了现实社会观察和深度考量、思想研究和精彩表达的外部契机。各领域各学科所遭遇的新问题,已经为研究者提供了质疑、批判和分析的新内容,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彰显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原则,③更是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拓展了开放性的精神空间。时代正在发出深切、真挚的呼唤:"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④那么,探索以"积极语用"为鲜明特征的理论学术的研究范式和表达风格的出新,正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应然之义。习近平总书记"5.17 讲话"针对哲学社会科学界长期存在的消极语用之痼疾,尖锐指出学术界"著作等'身'者不少、著作等'心'者不多"这类严重的空心化倾向,⑤而积极语用正是纠偏"空心化"消极语用倾向的一剂良药。理论学术研究语境中的"积极语用"与"消极语用",两者存在着基本属性上的本质差异。积极语用要求研究主体不满足于对既有理论学术体系的完整认知、理解和阐释,也不满足于对既定学理思想的单向度接受和一味宣扬,更要侧重在理解和接受基础上的独立研究、自主探索、主动质疑、深度创新,并在这种进取精神的引领下以输出型的精彩表达乃至创新表达为主要的价值指向。这种对理论学术思想缜密严谨、准确到位的"积极表达",在培育学术文化软实力中具有超越既定义理、不为它者替代的创新价值,特别有助于研究者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而"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⑥ 而在语言呈现的具体形态和语篇构成的总体风貌上,积极语用主张摒弃消极语用的种种老话、套话、空话和俗话,诀别一味"粘贴"旧观念、旧命题和旧思维这种陈腐的研究范式,从而彰显出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种积极主动、指向创新的表达风格。思想有新意,表达当随之——这样就能通过积极语用而着眼于学术研究的原创出新,而且从根本上超越"著书都为稻粱谋"这种消极语用、软弱涣散的疲弊状态。

## 三、如何以积极语用提升学术文化软实力

综上所述,如何通过积极语用而来提升学术文化软实力——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期待,面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能够通过学术主体的积极语用行为来释放缜密深刻、活力四溢的创造精神并且源源不断地产出理论学术的鸿篇力作。

第一,贯彻"百家争鸣"、拓展思维空间。这实际上是给学术主体创造一种积极语用的外部学术生态,即为激发独立思考(内语用)、精彩表达(外语用)而提供必要的前提。主体的内部语用即是运用语言来探索真理、化解问题的内隐的心智状态——而这需要文化制度与学术生态来保障其思维空间持续趋向开放化。当前国内学术生态是 1949 年以来的黄金时期之一。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诸多复

① 沙尔·巴依:《语言与生命》,裴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
② 沙尔·巴依:《语言与生命》,裴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
③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一元化指导思想能在扩容中应对多元化社会》。求是理论网. http://www.cn/zz/wwtj/201403/t20140317_330914.htm.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05 月 19 日。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05 月 19 日。
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05 月 19 日。

兴中华文化的方针大计,旨在积极修复一种开放多元、催生学术活力的文化生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彰显与落实,"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种核心理念的提出和弘扬,均有助于玉成建树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已经在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风尚,①意在推进学术文化和文艺创作的创新发展。而学术文化的勃兴,关键在于突破思想禁区、拓展运作空间,"自由"与"创造"从来就是天然的孪生兄弟。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纷纷吐放"思想之先声"的盛况,在中国文化史上确实难以复制、但未必不可复制。时代条件已经愈来愈趋向成熟,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特别是新一届中央领导已经凸显出这种高度自觉的"作为意识",习近平同志的"5.17讲话"就贯穿了这种鲜明的精神实质。一切有创造抱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当把握历史契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争取有所突破和建树。这里,等待历史契机与创造历史机遇构成一种辩证的关系。学术主体不能在消极等待中蹉跎黄金般的创造光阴,而应在平静而且坚韧的执著中积极、主动地把握历史的创造性机遇,以回应现时代的殷切期冀。

第二,聚焦现实问题、释放创新思维。这是理论学术研究中积极语用的应然逻辑起点,即为学术主体展开积极的内语用"思考"而铺砌思维轨道。正如习近平同志在"5.17"讲话中所表达的:"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②马克思自己就对"问题"的本质具有深刻的透视:"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③他本人的研究真正践行了这条原则。资本主义前期严峻的阶级对立和劳资冲突,引起他对工人阶级贫困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深刻洞察。在与工人交往、实地考察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了"剩余价值"才是工人们被剥削以致赤贫的根本原因。善于选择具有研究前景的深度问题,勇于聚焦反映事物本质的真实问题,这不仅仅需要学术主体敏锐的发现眼光和超人胆略,也需要学术主体无畏的风险意识和探究精神。历史新时期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的引领下,我国理论界人士抱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突破长期封闭的思想禁区,趟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思想认识路线,④并为理论学术的观念创新进而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创新,长远地开辟了广阔而深邃的发展前景。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极"左"政治路线禁锢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定背景下,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聚焦和讨论完全是一种重大观念蜕变的全新发轫,从而引发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一场极其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效地释放了社会各界长期被深深囚禁的思想创造力——其意义媲美于"五四运动"期间"科学""民主"意识在中华文明史上的空前觉醒。而同时,发生巨大蜕变的改革新实践反过来则催生着新观念的继续生长和发展。"农村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改革蓝图中的重心所在,从早期安徽省凤阳县尝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近期中央出台《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⑤终于完善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分置——这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历史性制度创新。而其背后则出自对生产关系调适的深思熟虑,以适应农村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现实新需要。"三权分置"对中国农村制度创新、思想解放具有不容低估的积极意义。以上典例都是聚焦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对重建理论、倡导新见,进而推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的深度改革形成了难以估量的显著积极作用。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诸如"钱学森之问"一类深沉而重大的问题,⑥关涉到社会制度、思想理论和实际改革等多层面、全方位和宏观发展战略,已经久久横亘在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未来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9日。

③ 马克思:《集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④ 特约评论员(胡福明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05月11日。

⑤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2016-10-31/c_1119815508.htm.

⑥ 钱老曾向温家宝前总理等坦陈:"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参见《温家宝看望朱光亚钱学森王大珩等科学家》,http://news.163.com/09/0806/21/5G2I7OV0000120GR.html.

征途上,亟待各阶层、多学科的深刻透视、综合诊断,并且开出可行的思想药方。

第三,提炼鲜活话语、作出创新判断。这是旨在落实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积极语用的核心目标。如果话语是一系列具有独立意义并且未必以完整的语法结构为限制条件的语用单位之集合,即如果话语以"关键词""中心句""精彩语篇"等外在形式而呈现,那么,话语系列中的"概念"(相对应的语词形式就是"关键词")就具有基础性地位。任何学科领域中"新概念"的产生,一旦被学术界所广泛认可或者即使短期内未必被认可,而就长远来看,必然要产生推动学科突破性发展的显著学术价值,甚至可能释放出撬转一定领域的学术研究范式转型的标志性意义。这是已经为人类学术演进历史所反复证明的一条真理。就学科而言,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首创文化人类学"后喻文化"新说之于世界文明演进范式的揭示;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从静态化、共性化"语言"中抽绎出动态化、个性化的"言语"新概念,历史性地推动了人类语言研究乃至文化发展的一种巨大质变;美国语言学理论家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所发现的人类语用的秘密机制"转换生成语法"则对语言教育更是具有莫大的直接启迪价值,它将天赋生命的"语言获得机制"通过不断的"表达"而输出、调适和趋优,说明"表达"已经成为"转换生成"的唯一具体途径。就社会文化而言,罗马国际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所用"可持续发展"概念之于地球资源有序开发与人类生态和谐发展的反思性警示,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著名警言"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与"认识你自己"对培育人类理性精神的智慧省思,人类伟大哲人卡尔·马克思的深刻判断"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所应对于主体观念与客体世界两者关系的明确揭示,[①]等等,上述这些充满了大智慧、新思维的鲜活概念或者话语判断,充分给予学术界乃至人类社会以不断增值的重大思想启示。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热议的"topic"(话题)正是"话语创新",尤其是话语中的"概念"创新。一个思维范式逐渐蜕变的时代,必然需要独特鲜明、持久增值的崭新"话语"来作为表征自己的文化符号,以此作为理论学术创新乃至社会转型的一大显性标志。

第四,创新传统狭隘文体、促进表达风格多元。这将整体性推动表达范式向着开放、发展、创新而作出积极的转变。能否破解理论学术文体与表达风格的固化现象——这关系到能否根本转变学术界表达范式、能否增强代表国家未来文化发展走向的理性思辨力量。"范式"(paradigm)是学术研究共同体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性价值特征,[②]而"表达范式"(expressive paradigm)则是指一定历史背景下普遍的语言哲学观与相应具体的语言表达观之间的高度有机之融合。其中,居于上位的语言哲学观规定了学术主体的价值理念和情感倾向,而具体的语言表达观则是在语言哲学观统领下对思维外化的具体认识和实施行为,决定着主体的表达品质及其创新程度。一定的表达范式反映着特定时代语言表达的精神特征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理论学术界的语言表达品质和研究成果质量。至于表达范式创新的具体内涵,既包括学术著述中作为理性力量表征的新概念、新范畴、新命题等一系列话语形态的产出,更是广义囊括着研究主体之表达过程与表达行为的其它全部形式要素甚至内容要素,呈现出学术主体完整的表达风格。这里,作为"篇章学"的重要内涵,"文体"与"风格"是通常容易被理论学术界疏忽的"语用形式要素"(即对应于"语用内容要素"而言)。首先要自觉突破固化、自闭的论证文体,努力创造以自由表达新观念、新思维为基本宗旨的开放性文体。无论是那种显得陈旧滞后、弱于创新的"理论体",还是那种刻板单一、表述乏味的"学术体",都不同程度暴露出以结构机械、形态固化或者论证方法唯重量化、片面追求材料为外部弊症,这些"格式化"的套路往往浮于文字表面,多少给读者留下一点过目即忘的遗憾后果。因此,如何以恰切、开放和灵动的"评论体"来承载自由活泼的个性化思维(特别是逻辑缜密、形式严谨的深度思辨),凭借多元宽松、撤去形式藩篱的自由新文体而挥洒一己才思——这是21世纪中国解放学术界思想创造力的题中要义。"五四时期"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每周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②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评论》和《新青年》等评论体报刊,对促进当时文化界的新思想新观念发挥了历史性作用。近年来,这种开放自由、思想活泼、善以"锐评""辣评"见长的自主"评论体",热捧指数一路走高,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大型媒体纷纷开设的各种评论专栏,[①]以敏捷聚焦改革现实凸显的诸多尖锐问题而获得很高的"吸睛率"和"点赞度",成为网络时代渐失优势的这些平面媒体最为出彩的品牌栏目——它们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界一道道亮丽的人文思想风景线。

与"评论体"相关,是作者整体表达风格(即文风)的蜕变。作者表达的显性风貌包括其造句性质、形态结构(语法结构、句子长短)、词语组合、语流节奏等。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表达方式上天然排斥情感或隐或显之渗入,仿佛灵动的情感、昂扬的激情均与"理论体""学术体"的理性论证和精彩评说天然水火不容,作者一旦释放了内心激情或融入了形象思维,似乎必定是"坠入"了另一种与"理论体""学术体"难以兼容的审美"文艺体"——这显然是一种长期固化的片面之见。卓越的表达风格往往能在语词的"熟悉"与内涵的"陌生"之间达成一种最恰当的平衡度,使读者产生一种似曾相识而又清新鲜活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源自诸多风格元素的有机介入。其中重要的是,对"理论体""学术体"注入必要的审美元素,即将文艺感性美如形象美、情感美和音韵美注入到遵循逻辑规律的理性论证中去,给读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审美享受。一身而兼融哲人与诗人双重气质的马克思,就是以这种逻辑理性和感人诗性相互交融的独特表达风格而为当今学人所镜鉴的典范。读遍马克思著作,那种缜密严谨、深邃入骨的强大的理性思辨力,与另一种抑扬顿挫、气韵饱满、激扬读者心灵的诗性感染力,荟萃一体、交相生辉。面对他艰深的思想演绎,并无一点麻木僵硬、无动于衷的阅读滞涩感。请看《共产党宣言》首尾的著名表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到的将是整个的世界。"[②]通过这种洋溢着思想震撼力、裹挟着澎湃激情的铿锵作响的"文字流",我们相遇的是一位吐纳才思、燃烧灵魂的伟大智者,拥抱的是一位热情四溅、活力迸发的诗人一般的哲学思想大家。

综上所述,要改变我国现阶段理论学术生产积习走弱、学术软实力持续下滑的疲软态势,必须围绕着建设好"国家语言能力"这个主轴,而其轴心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语言表达力和创新力。因此,全面改善学术文化生态和提升研究主体的思想力和表达力,是辩证统合的一体两翼;而"积极语用"新概念的提出与实施,则是增强学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和抓手。虽然,如何改变理论学术文化生产的现实状况至今依然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问题链",尚取决于更多层面一系列革新要素的有机融汇;但是,无论怎样,实施积极语用,提升研究主体的思想力和表达力,应当是化解"瓶颈制约"重要且可行的基本途径。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内容之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我们相信:创造条件、鼓励研究主体自觉主动合法地释放积极语用新活力,并且持之以恒、长期积累,就能够显著地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学术文化软实力。一个思想解放、理性发达的创新时代,必然是深具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新话语、新思维积极产出并踊跃发展的黄金时期,自然也是语言表达范式持续创新、颇有建树的一种"文化成熟季"——因此,学术主体的积极语用,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进步都将是不可估量的深远推动。

2014 年 6 月,中国政府已经通过联合国"世界语言大会"从语言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首次向全世界宣示了"语言能力建设"这一新概念、新命题和新战略。[③] 在此新形势下,通过研究主体的积极语用来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学术,无疑是其切实可行的重要而基本之途径。恩格斯关于西方文艺复兴

---

① 《人民日报》每天开设"评论"专栏,纵论天下大事;《光明日报》每天设立"评论"专版,评议现实各类尖锐问题;《中国教育报》每天开设"中教评论"专栏,讨论教育热点问题。各大报所刊"评论体"的共同特点是:及时聚焦改革时代的诸多问题,表达各界人士的开放性观点,使读者以深刻的思想启迪,获得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力。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1 页。

③ 记者宗河:《世界语言大会成果研讨座谈会召开》,《中国教育报》2014 年 06 月 21 日。由中方起草的《世界语言大会——苏州宣言》提出"语言能力建设"的新概念。无论在国家文化建设史上,还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均是第一次。

的那个著名论断,使我们对未来中国的新时代充满了殷切的期待:"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各学科思想巨人的崛起,必然要通过积极语用来释放创造性的思想力和表达力,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孜孜以求的"文化梦"。

# Positive Pragmatic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Soft Power of Academic Culture in China

PAN Yong

**Abstract**: The paper is reflection on the various disadvantages of the negative pragmatics theory in academic research, including the narrow lag, old concept and proposition in lack of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 simple negative argument style, boring and innocuous narration, etc.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elaborates the positive pragmatics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improve academic cultural soft power.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logic, and positive pragmatic generates individual "expression power" and "innovation", which has a highly natural correlation with the national academic cultural soft power; In terms of concept connotation, positive pragmatic is not only derived from the foreign academic term "pragmatics", but also it goes beyond the single subject of pragmatics. It releases the creative energy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 era conditions, the new stage and new practice in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ave provided the researchers with the external opportunity for social observation, deep consideration, thought research and wonderful expression. Then the article mainly demonstrates specific methods to use positive language to promote national academic cultural soft power, including carrying out the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s", expanding the thinking space, building the necessary premise for independent thinking, focusing on the real problem, releasing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positive pragmatics, that is, to use "thinking" to pave the thought track for positive internal language, to extract fresh discourse and make innovative judgment to implement the core goal of positive pragmatic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innovate the narrow traditional style, and to promote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pression paradigm.

**Key words**: Positive Pragmatics; Academic Culture; Soft Power; Important way;

(责任编辑:子聿)

① 恩格斯:《历史导论·导言》,见《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